

为什么有中国奇迹和 “中国烦恼”

胡联合 胡鞍钢 廖立勇 等著
廖立勇 蔡玉贺 魏 星 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为什么有中国奇迹和 “中国烦恼”

胡联合 胡鞍钢 廖立勇 等著
廖立勇 蔡玉贺 魏 星 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有中国奇迹和“中国烦恼”/胡联合等著;廖立勇,蔡玉贺,魏星主编.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07-0575-5

I. ①为… II. ①胡…②廖…③蔡…④魏…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2516 号

为什么有中国奇迹和“中国烦恼”

胡联合 等著

廖立勇 蔡玉贺 魏 星 主编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capress@yahoo.com.cn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本: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7-0575-5
定 价: 4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大智兴邦：为什么有中国奇迹	(1)
一、中国奇迹的根本奥秘在哪里	(1)
二、中国奇迹的根本奥秘的历史回顾	(3)
三、中国奇迹的制度建设因素总结	(28)
第二章 发展悖论：为什么有“中国烦恼”	(37)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37)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40)
三、中国的社会矛盾到底有多少	(41)
四、社会矛盾滋生的社会大背景	(51)
五、社会矛盾的原因分析	(68)
六、小结与对策	(77)
第三章 为什么说中国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	(83)
一、中国经济实力和增长的来源	(85)
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90)
三、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94)
四、简要结论	(95)
第四章 为什么说中国正在从世界开放大国向世界开放强国发展	(100)
一、回顾与评价	(100)
二、中国国家核心利益	(106)
三、2020 年中国国家战略目标	(108)
四、中国国家大战略	(109)
五、中国如何建成世界开放强国	(111)

第五章	为什么说中国外交战略在不断调整完善	(118)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		(118)
二、“两条线”外交战略		(121)
三、“一条线”外交战略		(123)
四、“全方位”外交战略		(126)
第六章	为什么要进一步推动实现国家良治	(131)
一、治理：全球发展的新命题		(131)
二、经合组织如何评价中国治理		(132)
三、中国治理的国情背景与主要实践		(135)
四、结语：从获取知识到创新知识		(139)
第七章	为什么要促进人的现代化	(141)
一、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141)
二、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在教育		(152)
第八章	为什么要制订科学的人口发展中长期战略	(164)
一、问题的提出		(164)
二、我国人口发展新的形势：数量、结构与质量		(166)
三、追求人口总福利：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质量		(171)
四、如何看待和解决人口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		(174)
五、中国人口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构想		(177)
第九章	为什么要追求公平的长期繁荣	(184)
一、中国的多维不平等		(185)
二、公平的意义		(188)
三、建立公平的发展观		(189)
四、促进中国公平发展的思路		(190)
第十章	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194)
一、传统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重大挑战		(194)
二、绿色工业革命与绿色发展		(199)
三、中国如何实现绿色发展		(202)
四、“十二五”如何体现绿色发展		(209)
第十一章	为什么民族政策要不断与时俱进	(215)
一、国家一体化制度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		(216)
二、与时俱进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属性和内在要求		(218)

第十二章 为什么要把冲突纳入制度化治理轨道	(225)
一、辩证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	(225)
二、应该善于把冲突纳入制度化治理轨道	(228)
第十三章 为什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234)
一、文化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234)
二、爱国、公正、自由、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根本	(237)
第十四章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控制贫富分化	(246)
一、我国贫富分化的基本情况	(247)
二、贫富分化问题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	(258)
三、小结与对策	(287)
第十五章 为什么要正确处理中国崛起的十大关系	(298)
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99)
二、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的关系	(300)
三、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301)
四、地区之间的关系	(302)
五、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304)
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305)
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06)
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307)
九、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308)
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310)
后 记	(312)

第一章 大智兴邦：为什么有中国奇迹

一、中国奇迹的根本奥秘在哪里

先哲云：“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发奋图强，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来的持续高增长，1978—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9.9%，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401202.0亿元，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1]

在全世界都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奇迹的奥秘时，我们认为中国奇迹的奥秘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上从制度层面尊重和保护亿万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权利和积极性，经济上以市场取向和宏观调控相结合来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上以公平正义来保护和激发亿万人民公平竞争社会流动机会的积极性，文化上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建设和发展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多样性，自然上则在于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有规模效应的世界大国。正是这些全方位的综合因素促成了中国奇迹。

但是，要寻找中国崛起奇迹的最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还是“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所揭示的深刻道理。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央决策制度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善于集中十几亿中国人的智慧，并理性地对待来自国外的建议或批评，从而能够作出科学的决策；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把科学的决策有效地转化为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行动实践。简单一句话，中国崛起奇迹的最大奥秘，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正确”或政治改良，

在于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完善政治决策制度，善于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制定了正确的决策，从制度上尊重、保护和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和成功、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所在。

中国奇迹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不但在于我们党和国家尊重和保护亿万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在于我们党和国家有科学的决策来保护和引导亿万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2]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首要的是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决策和执行机制，保证决策和政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3]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4] 必须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作出顺应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正确决策，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则是政治决策者的功绩所在。一方面有亿万群众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一方面又有保护亿万群众积极性的政策法律，这就是我们国家能够迅速成功崛起创造中国奇迹的最大奥秘所在。实际上，邓小平早就深刻地指出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5] “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6] “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7]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努力也被认为是民富国强的本原。“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公众财富、国家财富和私人财富赖以产生的本原。”^[8] “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

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9]有的甚至认为只要保证法律能够保护一切人都能享有自己劳动的果实，就能使国家繁荣起来。^[10]只是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仅有人们自身的努力实际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有形之手的引导。而由于受体制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掣肘，西方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存在诸多欠缺，难以及时有效地作出顺应大多数国民利益需要的政治决策。这就是很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体制病”。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党和国家的决策效率高，只要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就会取得成功。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充分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决策及时准确高效，极大地保护和激发了广大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的积极性，从而必然创造出财富快速涌现的中国奇迹。

二、中国奇迹的根本奥秘的历史回顾

先哲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下面，我们不妨回顾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的历史进程。透过对这些总体上不断与时俱进地顺应人民需要、反映人民心声、代表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的历史回顾，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加深对中国奇迹的根本奥秘的认识。

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强调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就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这是我们创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崛起奇迹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同志的成功，正在于他坚持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的科学观点和做法，正在于他创造和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的群众路线和领导方法。同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晚年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严重，脱离了群众路线，脱离了实际。毛泽东同志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13]实际上，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也可以转化为

好事，因为它迫使我们总结教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明确指出：“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14]“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5]“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6]我们在寻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奇迹原因的时候，决不能忘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经艰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的历史前提和起点。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我们取得改革开放中国崛起奇迹的根基，包括前人和历史的错误也成了我们中国得以成功崛起的财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启中国成功崛起奇迹进程的标志。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人民利益需要的重大决策，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全会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7]因此开始启动全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18]一是强调发展经济这项中心工作，要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下放权力，按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大力恢复与发展农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确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三是强调要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沉重告诫全党全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四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要保障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到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

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0]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核心是顺应和集中亿万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期待，顺乎广大人民的利益需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等各方面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创造物质文化财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我们党迅速克服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顺应各地广大农民的心声，承认农民的实际创举，恢复和扩大了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中副业和集市贸易，承认和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分田到户的承包制和生产责任制，使农村面貌迅速焕然一新；同时迅速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很快的改善和发展，也迅速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开启了中国迅速崛起奇迹的新征程。

1980年8月，中央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意见。^[21]这标志着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全面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进程，开始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领导人交接班等制度问题，以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衡量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好坏的三条检验标准：这就是（一）经济上，是否有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是否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组织上，是否有利于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22]要以这三条标准来检验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

邓小平强调：目前的紧迫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及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

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23]邓小平把人才问题作为衡量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准，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多次强调：“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24]“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25]“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26]“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27]“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28]

邓小平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29]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从根本上都是从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人的发展（如经济上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发扬人民民主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组织上更好地培养、发现、选拔和使用人才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衡量的，归结结底就是要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享有更充分更切实的人民民主，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也是主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思想。正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在政策法律上充分尊重亿万人民的愿望，平等保护和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瞄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有针对性地进行。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0]“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

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1]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32]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他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33]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34]

邓小平强调要解决家长制现象。他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之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上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35]

邓小平还突出强调要解决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36]对于违纪违法的，不管是谁，都要严格依纪依法平等处理，不允许任何人逍遥于党纪国法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37]

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这些弊端，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明确指出：“制定是决定因素”；^[38]“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9]“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0]“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41]“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

大错误。”^[42]邓小平强调：“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43]“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4]“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显著的新高度，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从而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46]中央决议明确指出：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7]中央决议强调，“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48]主要的是：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缺乏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科学研究。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

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如认为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与苏联的论战，特别是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49]第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步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步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够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50]但是，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它顺应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心声，并依

靠广大人民，终于在1976年10月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和通过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在于我们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能够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又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并注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建设，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根本保证。^[51]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对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都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深入推进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52]大会提出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的二十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提出了要立足自力更生，同时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经济工作基本原则；提出了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充分调动和有效发挥劳动者等各方面积极性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方法。大会报告强调：“我们的全部经济，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把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这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53]大会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力加强教育等各项文化建设，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普及教育，大力加强理想、道德、纪律等思想建设，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大会强调，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的保证和支持。大会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确良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54]“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5]大会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